

20世纪30年代德国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军事合作

曹霞

(湘潭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20世纪30年代,德国与中国国民政府在军事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德国军事专家以“私人身份”受聘于国民政府,帮助国民政府整训军队、联系军购、建立现代化军事教育乃至直接参与指挥对日作战。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军事贸易使中国在抗战初期困难的国际环境中获得了大量先进武器,国民政府据此装备了一定数量的德式部队,在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关键词] 德国;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军事贸易;抗战

[中图分类号] E29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5)03-0107-07

Military Cooperation between Germany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1930s

CAO Xi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30s, Germany and China national government carried out extensive and in depth cooperation in the military field. German military experts with "private capacity" were employed by the China government in order to help taking steps to train the armed forces, contacting military purchases, building a modern military education and even directly involving in the command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 Through the military trade between Germany and China, China got a lot of advanced weapons in the early difficul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where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s equipped with a number of German troop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 which played a huge role in the front of battlefield.

Key words: Germany; national government; military advisers; military trade; war against Japan

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在经济危机中,德国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14.6%,1930年超过22%,1931年达33%,到1932年竟达45%之多,有550万人没有职业,其中包括大批退役的职业军人。^[1]同时,《凡尔赛和约》导致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日益增长。在此背景下,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开始登上德国政治舞台。在军事装备与技术水平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德国对工业原料、战略资源和工业品市场的需求也与日俱增。由于中国地域广阔,自然资源丰富,而且是一

个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因而德国认为中国是较为理想的贸易伙伴。在远东,日本趁欧美列强无暇东顾,加紧了对中国的蚕食和侵略。美、英的绥靖政策、苏联因领土问题与中国产生的紧张关系使得中国国民政府在国际社会中一度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经历了对苏俄式革命的害怕、对英美式民主的怀疑后,蒋介石转向了坚决反共,同时宣传铁腕统治的德国法西斯主义及德国的军事现代化,蒋介石认为德国的先进军事思想和技术最符合中国建设现代国防的需要。在此背景下,中德双方在20

收稿日期: 2014-07-02

作者简介: 曹霞(1975-),女,重庆大足人,湘潭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德语文学、德国文化。

世纪30年代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合作,德国对华派遣军事顾问,输出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中国则对德出口矿产资源等物资,双方在友好平等基础上合作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一段历史,值得认真研究。

一 人力资源的合作:“私人身份”的德国军事顾问

国民革命军最初是在苏俄顾问的指导下参照苏俄建党建军的原则组建起来的。政治信仰的分歧使国民革命军中的国、共分歧日益扩大,矛盾不断尖锐。蒋介石在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即开始秘密与德国方面接触,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仍需维持且德国受《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导致这些活动处于十分隐秘的状态。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国共关系完全破裂,国民党政府在军队中“清党”。此后的“中东路事件”进一步加剧中苏关系的紧张,已经逐渐稳定的南京政府遂决定全面向德国靠拢,在军事上以德国顾问取代苏联顾问,全面指导军队建设。^[2]与此同时,德国注意到了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政局变化,确立了以南京政府为主要合作对象的积极对华政策,筹备为中国专门成立经济、运输、卫生以及情报5个方面的顾问团,虽然没有正式的“军事”顾问名衔,但实质上是以军事合作为主旨。^{[3]74}1928年6月,德国陆军重炮专家马克思·鲍尔上校正式被南京政府聘任为“经济”总顾问,由此正式拉开了南京国民政府与德国军事顾问合作的序幕。鲍尔虽名义上为“经济”顾问,且对外宣称是与德国政府毫不相干的私人身份,但实际从事的是指导中国军事改革和建设的工作,中德双方官方其实是心照不宣的。鲍尔的上任意味着一个德国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团的形成。鲍尔在正式任职前,特意花了数周时间对上海、南京以及汉口等地做了专门考察,对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防体系进行了周密的研究。^{[4]100}上任不仅,鲍尔随即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整理中国陆军建议书》,提出在中国建立完整的军工、交通、邮电体系的设想,建议国军接受最新式的德国陆军训练方法,配备德国标准武器装备,并建立和优先装备示范教导部队。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鲍尔的建议书专门提到了在中国海岸设立有效的军事防线和组建化学武器部队的重要性,这些都是

中国的国防体系中极度薄弱的环节。同时,该《建议书》还附上了一份名为《未来陆战的战术和技术》的战术纲要,充分估计了军事技术的进步对未来战场的影响,对未来中国军队的反侵略作战极具参考价值。^{[4]104}鲍尔的建议深得蒋介石赞赏,遗憾的是由于染上天花,在受聘不到半年鲍尔就在中国病逝。

1930年夏,在鲁道夫·赫斯推荐下,德国陆军中将乔治·魏泽尔前往中国担任国民政府总顾问,他的到来使德国顾问团的军事性质更加明朗。魏泽尔毕业于德国陆军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战功显赫而受到德皇亲自嘉奖,一战结束后升任德军参谋本部主任。魏泽尔一上任,即匆忙投入刚刚爆发的中原大战,指挥蒋军在河南登封等地实施了中国军事史上首次步、炮、空诸兵种合成作战,取得显赫战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暴露无遗。德国顾问团建议南京政府尽快组建由德国军事顾问负责训练、参照德国国防军的建制、装备德国陆军制式武器的德式部队作为国军的中坚力量,即后来所谓的“德械师”“德训师”。南京政府原计划组建约60个师的德式部队,但由于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大约只建成30个左右完全接受或者部份接受过德制装备与德式训练的师,这些部队在抗战初期成为了迎战日军的国军主力。其中,德制化程度最高是蒋介石的四支嫡系部队:第87、88、36师,以及唯一完全按德国步兵标准编装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这四支部队成为当时国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是真正的“德械师”。其他接受德国顾问训练和部分装备德式武器的部队,可称之为“德训师”。德式部队陆续组建后,先后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福建事变和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特别是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中,德国军事顾问参与指挥隶属第19路军的第87、88师抵抗日军的步坦进攻,令日军付出了重大代价,初步展现出了新式国军的现代化作战能力。1933年的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顾问团成员海因茨·孔祥熙视察前线,考茨少校和威伯尔中尉则在后方坐镇指挥东北军中的德训部队与日本关东军作战。^[5]在训导组建德式部队的同时,以魏泽尔为首的军事顾问团还帮助南京政府完善了现代化

军事教育体系,先后协助国民政府创建了现代化的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以及特种兵学校,令中国军人接触到了世界前沿水平的军事科技和军事战术战略,对落后的旧中国的军事思想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洗涤。

1934 年 4 月,魏泽尔离职,由与蒋介石私人关系最密切的、被誉为德国“国防军之父”的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将军接替其职位,这也标志着中德军事合作高潮的来临。塞克特 1933 年曾接受蒋介石邀请以私人身份来华访问,当时他就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中国军队改革建议书”,内容包括建立中国军事重工业企业、改革军事指挥与后勤系统、效仿德国的军费审计制度、重组军政部,等等。其涉及范围之广,无异于为中国构建一幅国防事业现代化的蓝图。塞克特尤为指出:“中国军队的武器处于缺乏的状态,然而向外购买武器、弹药只能视作过渡期的行为。若本土无可靠的军火生产,以资平时练兵和战时所需,则中国势必被迫依赖外国进口,而在战时无法自保。”^[6]日本的步步紧逼亦使国民政府感觉全面战争的爆发已迫在眉睫。塞克特的建议无疑具有很大的针对性,蒋介石急需塞克特留下来帮助整军备战,因而给予他很高的礼遇和地位。根据蒋的训令,塞克特可以以“委员长委托人”的职务与国民政府及军队各部门首脑谈话,在蒋不在之时,可以代表蒋直接向国民党各军政部门发布命令,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军队中的地位之高史无前例。^[7]鉴于中日之间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塞克特急切为中德军事贸易奔走呼吁,牵线搭桥。在塞克特的积极努力下,南京国民政府于 1934 年初与德国方面签订了《中国矿物及农产品同德国工业品及其他产品的易货贸易协定》(简称《中德易货协定》),其内容主要是中国可以用矿产、农业等原材料和物资直接购买德国的武器装备,这对缺乏外汇且面临国际封锁的中国国民政府来说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3]150}在塞克特任内,中国各军事机关聘请的德国顾问人数大幅增加。塞克特正式担任军事总顾问多月后,因劳累过度而造成健康状况急剧下降,不得不于 1935 年春回国,不久于 1936 年病逝。在短暂的在华工作期间,塞克特忠实职守,为中国国防事业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他所设计的上海至南京间的江防工事,被称为“中国的兴登

堡防线”,只可惜后来由于战局仓促未被很好地利用。

接替塞克特的是法肯豪森将军。法肯豪森亦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家庭,早年参加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又进入柏林大学东方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并且在 1909—1912 年之间担任过德国驻日本军事武官,对中日两国都有很深的认识。1935 年,法肯豪森赴华担任南京政府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军事总顾问。蒋介石对法肯豪森同样信任有加,让其参与了对日全面战争的各项筹划工作,其中不乏中国国防安全的最高机密。法肯豪森不负重望,于同年 8 月 20 日提出了《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中日双方的战略态势做出了相当准确的判断。他指出,在目前国际形势下,列强没有联合或者单独干涉日本侵华的可能性,中国必须立足于全力自卫。他鼓励国民政府应坚定奉行抗战路线,并卓有远见地提出“持久抗战”和利用四川作为抗战“最后防地”的策略。^[8]其《建议书》中写道:“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属日本。日本对中国国情,极为了解。”“……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最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目前国军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9]1936 年 4 月,法肯豪森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国军在日占区应进行游击战,以配合正面战场。此后战局的发展基本印证了法肯豪森的判断。

法肯豪森不仅提出了建议书,还以总顾问的身份在不同军政场合进行了一系列演讲。法肯豪森务实地提出,以当时中国的工业能力、财力与官兵素质而言,要建立真正德国标准的陆军是有困难的,中国的“国军六十个师的整军计划”只能算是现代陆军初步的雏形,与真正现代化的标准有相当距离,故而法肯豪森认为国军应先成为“轻装快速部队”,这就是“轻步兵”的建军概念。就当时而言,这一思路是非常值得借鉴的。这也是法肯豪森比前任几位军事顾问更为高明的地方。不过法肯豪森同样推崇“成立虽小而极端新式之国防军”,对德械师的示范作用十分肯定。这种普鲁士式的建军思想,是以少数精锐部队作为样本带动全局,重视技术兵种的作用,并在全军中贯彻严格的技战术训

练。然而中国的国情与德国乃至欧洲都有很大不同,在不具备现代化工业基础和兵员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军令政令难以统一的特定背景下,少数精锐部队的作用是有限的。事实也证明,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中,国民党中央军所属德系精锐部队虽英勇作战,予敌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几乎全部消耗殆尽,未能挽救全局。现代化战争并不是单一兵种的对抗,而是陆、海、空及后勤、情报、人力资源乃至工业能力等全方位的力量比拼。数量有限的准现代化陆军在更为现代化的敌方三军攻击下是独木难支的。但是,训练有素的国民党德式陆军仍然取得了不俗战绩,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第88、87师在“庙行大捷”重创日军,一役歼灭日军三千多人,使日军遭遇甲午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极大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在淞沪战役中,许多德国顾问不顾安危亲临前线,配合指挥,其“突击群战术”——即集中兵力对敌进行点突破后持续挺进,再由后续部队包围敌人扩大战果的战法,已初具“闪电战”的雏形。在淞沪会战后期的溃退中,四支德械师作为殿后部队,力保国军主力不被日军包围,为其他部队的收拢和在南京城下构筑防线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日本报纸和外电事后惊呼,说这是一场“德国战争”。^[10]虽然未免言过其实,但拥有正规化作战经验的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以及德式部队在初期正面战场上发挥的中流砥柱的作用,都是挫败日本侵略者迅速征服中国野心的重要因素。国民政府鉴于法肯豪森的卓越贡献,特授予其二等“云旗”勋章和绶章。

法肯豪森还为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教育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他的任期内,各种兵科的德国顾问来到中国军校担任教官,将西方军事观念如纵深部署、内外线态势、机动作战、攻击、防御重点等理论及实务带入中国军队教育训练当中,让封闭的中国军队接触到完整的西方现代军事科学。法肯豪森在任期间不仅为国民政府的抗战方略出谋划策,也促成了中德军事经济合作。中国用钨砂等丰富的矿产品换回了源源不断的德国军火,使国军武器装备的水平迅速提高。德国援助的军事工业企业也中国内陆地区陆续建立。这些都引起了日本对德国的强烈抗议。为此日本政府多次向德国政府施

加压力,极力要求德国将驻华军事顾问撤走并取消对华军事贸易,甚至不惜以退出三国同盟为要挟。面临日本的压力,希特勒一度试图平衡日、华关系,既想拉住日本作为盟友,又不想破坏与中国的关系,对日本的抗议采用各种方式敷衍。直至1938年5月,希特勒才下定决心,严令所有在华德国顾问一律回国,否则将视为叛国,永远开除德国国籍,财产全部没收。^[11]1938年7月底,法肯豪森被迫率最后一批德国顾问离开中国,从而结束了长达10年的国民政府与德国军事顾问的合作。

总观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工作,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为施展个人军事才华而投身于中国国防事业的。但是,不管他们来华的初始动机是什么,他们在中国卓越的工作业绩和严谨的专业态度都令我们肃然起敬。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奋起御侮,反抗侵略,这段历史是不应该被忘却的。法肯豪森后来在一封信中写道:“回顾近十年在华的工作,我们感到非常光荣和自豪,总共有一百三十多名同志,其中八位为了他们的任务而失去生命,他们是为中、德的共同利益而牺牲,我们已经在最艰难的环境中,发挥了德国军人优良的传统,帮助我们的朋友防卫他们的生存与尊严。这些均将会永垂于中、德关系史中。”^[7]

二 军事贸易合作:德制武器装备源源输入中国

如果说担任军事顾问在形式上还是德国军官帮助国民政府的“个人行为”,那么德国军工企业对华武器出口则完全是在德国官方鼓励和支持之下的国家贸易。德国对中国的军火出口,以1934年为界限分为两个阶段。1934年之前,德国与中国的军火贸易主要采取的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简便但规模有限。这一时期的军火贸易主要利用德国军事顾问的私人关系来推动。在魏泽尔任职的1930年,德国每月运华武器平均为1000万马克。^[12]

1934年1月,塞克特的好友、德国商人汉斯·克莱恩在德国军方、经济部和国家银行支持下,成立了“合步楼”公司,即“工业产品贸易公司”,专门负责与中国洽谈武器装备出口。由于国民政府外

汇储备有限以及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迫切来临,1934 年 8 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与克莱恩分别代表中德双方秘密签订了《中德易货协定》。根据该合同条款,中国可先行向德国订购军火物资及军工设备,然后再以农矿产品偿还。这种交易方式在当时无疑是更有利于中方的,双方交易额迅速扩大。1935 年中德官方关系由公使级上升为大使级后,南京政府希望稳定地从德国进口先进的军事设备以应战争之需。至 1935 年底,南京政府在德国订购的军火物资总价值已超过 1 亿马克。从订货的种类来看,从钢盔、子弹、步枪、防毒面具、望远镜等单兵作战装备,到各种口径的战防炮与牵引车、高射炮、战车(即坦克)、军用架桥设备等重型陆战装备,直到战斗机、潜艇等高价值海空武器,凡是中国方面认为用得上的,都列入采购清单。德国方面则一概应允。从比例上看,野战炮、高射炮、高射机枪等重型武器和西门子公司的通讯器材、窃听器材等技术保障设备数量明显增加。特别是著名的德制 88 毫米高炮和探照灯等防空设备在后来的对日防空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3]在空军装备上,从德国订购的少量梅塞施米特型战斗机和斯图卡型轰炸机在抗战初期构成了国军空军的主力机型。在这批飞机上受训的飞行员也成了国民党空军的种子飞行员。

1936 年 1 月,南京政府派团前往德国进行“经济”考察,实为重点洽谈军火贸易。同年 2 月,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顾振为团长的代表团抵达德国,受到希特勒的接见。同年 4 月,中德两国政府签订了《德华信用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由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 1 亿马克的货物信用借款,专门用于购买军火及重工业设备,年利 5 厘,无折扣、佣金、手续费等。^[14]中国则以钨、锑等战略原料和农产品偿付贷款。对此,美国人的评价是:“对于一个不能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借款的中国政府来说,协议确定了一种经济交换关系,中国第一次成了完全平等的伙伴。……中国不必再靠乞讨国际救济金度日了。”^[15]¹⁵⁴《德华信用借款合同》将两国间的军事贸易推向高峰。1936 年中国向德国订购武器额达 6 458.1 万马克,实际交付达 2 374.8 万马克;1937 年订购 6 098.35 万马克,交付 8 278.86 万马克。^[15]²⁶¹德制武器装备源源不断输往国军各部队尤

其是中央军。资料显示,在抗战全面爆发的初期阶段,中国对日作战军火有 80% 左右来自德国。^[16]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前的几周,孔祥熙仍在德国洽谈军火贸易。

看待当时德国的对华武器出口问题,应当联系中国在抗战前夕所处的国际大环境来作出公正的评价。众所周知,英、法、美操纵下的“国联”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始终持暧昧态度。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西方国家对中日之间的冲突不是保持“中立”,就是充当“调停”的角色。所谓对中日双方都实行的武器禁运,实际上只是有利于日本。美国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仍在向日本供给石油、钢铁等战略物资,对日本步步入侵中国的罪行实际上采取的是隔岸观火的态度。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说,“我们在此地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不叫嚷,静悄悄,有礼貌地,尽可能不发布新闻。”由此赢得日本人“由衷地感激事变后我国政府的态度与行动。”^[17]⁴⁶⁴英、法等国的在华利益虽然也受到损害,但考虑到外交上有求于日本,同样只是在舆论上鼓噪一下。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在 1937 年 9 月向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讨好到:“我决不搞两面派!”并拒绝在布鲁塞尔会议上讨论援华问题。法国则害怕日本进攻法属印度支那半岛,为了不得罪日本,竟禁止外国战略物资经越南输入中国。可以说,抗战爆发之前的中国几乎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而德国这种平等、快捷、有求必应式的大规模对华武器出口,以及大规模派遣军事顾问帮助中国政府整训军队的做法,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种巨大的军事援助。正因如此,日本对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友谊”极为不满,不惜以退出德日同盟来迫使德国停止对华军事援助。而德国的态度是能拖则拖。希特勒指示:“只要中国支付外汇或相应地提供军工生产原料,那么已与中国签订合同的军火贸易就可以继续进行,当然对外要尽可能地伪装,尽可能不要再接受中国方面的军事订货。”^[18]²⁴⁰在 1938 年德国召回最后一批驻华军事顾问之后,德国依照顶住日本的压力继续履行对华武器出口合同,而且没有任意抬价。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德国政府一方面表示“严守中立”,另一方面应中国政府紧急订货请求,在 11 月从其

国防军装备库中抽调了价值5300万马克的武器装备紧急运往中国,12月又启运了包括两批十几架俯冲式轰炸机在内的价值4400万马克的军火来华。^[19]战争爆发后,日本持续不断地通过驻德大使向希特勒政府提出抗议,并威胁要动用海军扣留运往中国的一切装载有军用物资的船只。德国外交部在对德国驻日大使的电报中指示:“……日本欲将对华战争当作反共协定上所谓的反共战争的行为是不正确的,……德国的对中国输送武器,不能作为日德协议的对象。”^{[17]487}面对日方的抗议,德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魏泽克推委说:“我不是军火商人,我不知道在公海上运输战争物资的事情。”这当然不可能瞒过日本人,连英国驻中国的谍报人员都报告说:“德国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不仅如此,它们的军事顾问实际上正指挥着战争。”^{[18]244}

随着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接连失利,大片国土已经沦陷,沿海港口皆被日军占领,德国通过海运向中国输送武器装备变得越来越困难。由于国际通道几乎被切断,国民政府欲对外输出物资也变得困难重重。与此同时,欧洲上空也已是战云密布,德国急需日本这个盟友在远东牵制苏联和美英,因而希特勒经过再三衡量,最终下定决心放弃蒋介石政府。这一转变的标志,就是希特勒于1938年初改组德国政府,清扫了外交部和国防部中的所谓“亲华派”人物,并于同年2月承认伪“满洲国”。至此,中德双方的友好关系无法再维持。即是如此,在1938年2月仍有12架德国轰炸机和战斗机运抵香港。次月,德国又通过香港运来价值3000多万马克的军火。^[20]1938年7月,最后一批德国军火,包括克鲁伯厂生产的150mm榴弹炮炮弹6000发、伯勒厂生产的470mm炮弹18000发以及毛瑟步枪5000支,假借芬兰一家公司名义转运到中国^[21]。1941年7月,德国正式承认汪伪“国民政府”,蒋介石的重庆政府终于宣布与德国断交,中德军事贸易彻底断绝。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4年8月《中德易货协定》签订到1937年10月,至少有价值约1.44亿马克(约合5816万美元)的德国军火运抵中国。^[22]1937年抗战爆发后,德国企业已经开工的中国订单也达7.2千万马克,且还不包括价值6.8千万马克

的海军订单。^[12]在德国的武器出口国家清单中,以1936年为例,对中国的出口额就占了全部出口额的28%。可以说,在抗战前期和抗战初期,德国一直是中国军队现代化武器装备的主要供给国。

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军事合作达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程度,这种合作的规模和影响当时是引人瞩目的。只有尊重历史,才能对中德关系的全貌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总体来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德国是强国,中国是弱国,但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是平等的、友好的、互利的。尽管中德双方是各有所需,但对于处于民族存亡危机之中的中国而言,德国的军事支持为国民政府现代化的国防基础和抗战初期的正面抵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代史上,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几乎从来没有取得过平等的地位,所谓“协议”或者“协约”从来都是不平等条约的代名词,在军事领域更是没有同列强享有同等话语权的机会。然而,国民政府与德国政府之间的军事合作和贸易,不仅是以较为平等的姿态进行的,而且更体现了德方对中方处于危难境地的理解。无论是以易货贸易的形式进行军火输出,还是在战争爆发之初以紧急方式抽调德军装备支援中国,都是一种雪中送炭的帮助。德国军事顾问强烈的敬业精神和不惧牺牲投身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表现,都是值得中国人民怀念和尊敬的。尽管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德械师”“德训师”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也未能阻挡日军侵华的步伐,但其在国民党初期抗战正面战场中的作用是不容否定的。在其他列强袖手旁观的危急岁月里,如果没有中德之间的军事合作,中国军队的损失将更为惨重,牺牲人数将更为巨大,抗战形势将更加严峻。

当然,从主观动机上说,国家之间的交易难以用高尚的道德情操来评价。正如有学者评论:“德国援助中国加强抗日实力绝非是伸张正义或同情我国被侵略的遭遇,即连当时柏林政府的亲华派,……,他们仅希望在面对纳粹政权的亲日压力下,维持对华友好关系及固定贸易政策以换取所需之原料。”^[23]中德关系在后期的冷淡直至断绝,充分证明了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

谊。对中德之间在那段岁月里的紧密军事合作,我们应采取理性和公正的态度,既不应过高评估其对中国抗战的分量,也不应回避和抹煞它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 [1] 里昂耐尔·理查尔.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1919—1933[M].李末,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84.
- [2] B Martin. *Deutsch – Chinesische Beziehungen 1928 – 1937* [M].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3, 227 – 231.
- [3] Kuss, Susanne. *Der Völkerbund und China – Technische Kooperation und deutsche Berater* [M]. Münster: LIT Verlag, 2005.
- [4] Vogt Adolf. *Oberst Max Bauer* [M]// Martin, Bernd. *Die deutsche Beraterschaft in China 1927 – 1938*. Düsseldorf: Droste Verlag, 1981.
- [5] Drechsler Karl. *Deutschland, China, Japan, 1933 – 1939* [M].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64. S49.
- [6] 马文英.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国军火贸易的推广展[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4(23):149.
- [7] 不 鸣.德籍军事顾问在中国:上[J].军事历史,2005(2):32 – 39.
- [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演讲纪要:上[J].民国档案,2005(1):33 – 35.
- [9] Liang Hsi – huey.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M]// Martin, Bernd. *Die deutsche Beraterschaft in China 1927 – 1938*, Düsseldorf: Droste Verlag, 1981, 142.
- [10] 傅宝真.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史传[J].传记文学,1973(2):7 – 10.
- [11] 王 喆.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与中国抗战[J].军事春秋,2008(1):22 – 25.
- [12] 马文英.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德军火贸易关系的推展[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4(23):144 – 165.
- [13] 辛达漠.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外交关系[J].传记文学,1983(2):125 – 128.
- [1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329 – 330.
- [15] 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M].陈谦平,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 [16] 傅宝真.色克特将军第二次使华:续——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史传[J].传记文学,1973(2):78 – 90.
- [17] 鲍家麟.列强对中国抗战的态度:1937—1939[M]//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二十六编:对日抗战: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8] John P Fox.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 – 1938: 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19] 马振犊,戚如高.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16 – 317.
- [20] 胡之信.中国革命中的国际关系:1919—1949[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151.
- [21] 沈庆林.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27.
- [22] 章百家.德国顾问与国民政府的抗日战备——为抗日寻求外国军事援助之一[J].百年潮,2004(9):26 – 31.
- [23] 傅宝真.对《德国顾问团在中国》任务研究的认识——从马丁博士一篇演讲引发的省思[J].近代中国,1988(67):130 – 139.

责任编辑:李 珂